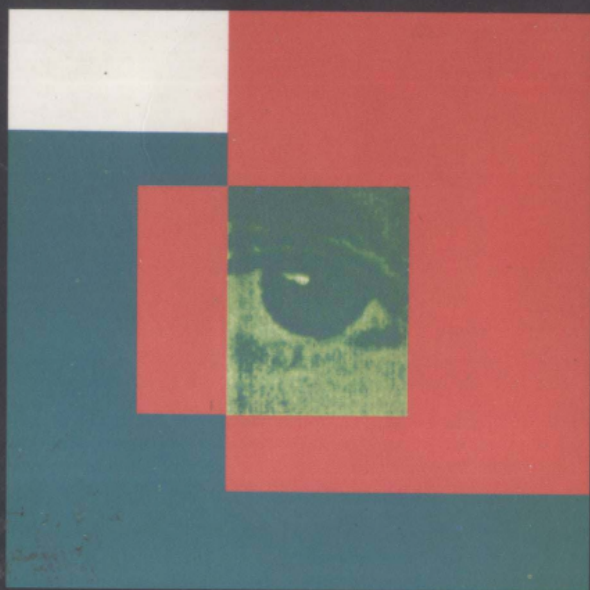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 劉青峰 編



[illegible][illegible]

This is a scan of a blank page from a document. The page is mostly white with some minor scanning artifacts. There are dark, irregular borders along the top, bottom, and right edges, which appear to be the edges of the scanner bed or the paper itself.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are present on the p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This is a scan of a blank page from a document. The page is mostly white with some minor scanning artifacts or dust specks visible. There are dark borders along the top, bottom, and side edges, which appear to be the edges of the scanner bed or the paper itself. No text, figures, or tables are present on this page.



978-0-16-200789-6

9 789622 016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一)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

劉青峰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 1994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封面設計：王雪青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620-0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114 號廣亞大廈十樓 A 座

Hu Shih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Edited by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620-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陳方正

「適之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這句感慨中又流露出得意之情的說話是不錯的。事實上，真正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總不免帶有爭議。中國之有現代意識，以「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為開端，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則以胡適1917年一月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為起點，這大概沒有多少爭論。然而，作為中國啟蒙領袖以及自由主義先驅的胡適，對中國的新思潮、學術風氣以及政治發展，究竟起了何等作用，卻始終是七十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即使撇開在二、三十年代胡適所捲入的多場論戰不提，或者五十年代的「批胡運動」不提，單就過去三十年間海外晚一輩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也都還因為本身思想傾向不同而對胡適有激烈對立的看法。可以說，對胡適的爭論未曾止息就是中國現代化路向爭論未曾止息的反映。單從這一點，也就多少可以說明胡適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了。

前年適值適之先生誕生百周年紀念，十月間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了一個「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繼同一年春間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文化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大會之後的一次中國海外知識分子聚會，規模雖然比夏威夷之會為小，議題也較之為具體和專門，但會場討論氣氛之活躍和熱烈，卻並無遜色。

我們所感到特別高興的是，與會的四十位海內外學者之中，不但有曾經親炙過胡適先生的長一輩學者如鄧廣銘教授和唐德剛教授，以及在胡適自由主義影響下成長的學者如林毓生教授和周質平教授，更有許多大陸中青年一代的「胡學」專家，如耿雲志、沈衛威、胡明等諸位。因此，這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一個老、中、青三結合的胡適討論會。從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來的不同輩份中國學者，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一同辯論像胡適這麼敏感和仍然充滿爭議的題目，證明中國現代化的路向雖然還在探索之中，但探索方式已經大大改變，而中國文化的反省和創新也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了。這本集子就是這個會議論文和論辯的一個紀錄。

最後，我要代表本所特別感謝負責會議組織和主持這本論文集編輯工作的劉青峯女士，以及她的《二十一世紀》同事。沒有他們的辛勤和敬業精神，這個會議和這本集子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九九三年十月於用廬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研討會 開幕詞

金耀基

今年是胡適先生的百歲誕辰，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爲此舉辦「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學術會議，應該是一樁非常值得做，非常有意義的事。在這裏，我代表大學，要向參與會議的學者、專家，特別是遠道前來的各位，致最深的歡迎之忱，對於中國文化所陳所長方正兄、劉青峯、金觀濤先生等其他同仁爲籌開這個會議所花的心力勞苦，表示由衷的感佩。

作爲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或主將，胡適對於現代中國文化的性格與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假如說孫中山之推翻帝制，創建共和，是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宇宙，那麼，胡適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批判傳統，帶動新思潮，改變中國人或中國知識人的思想視野，則不啻是改變了中國的文化宇宙。胡適曾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余英時先生說：「從思想史的觀點看，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孔恩 (Thomas Kuhn) 所說的『新典範』 (new paradigm)。」胡適之影響不止限於思想史，也不止限於學院，而是影響到整個文化領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當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看，胡適的貢獻與影響即使在人文學科中也是有局限的，不過，縱使他做的只是「開

風氣」，或者只是「啓蒙」工作，但現代中國文化如果除去了胡適，將必然會是不同的面貌。

胡適不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爭議最大的人，胡適之「爭議性」與他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之有爭議性是不可分的。他所建立的「新典範」在1949年後，在大陸受到全面批判，並已爲一個具有強烈政治取向的馬克思「典範」所替換；即使在大陸以外的思想文化界，他的典範也已受到越來越大的批判與挑戰，已經失去了支配，甚或主流的地位。但這一切不是否定，而正是說明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的重要關係。

在胡適先生一百歲誕辰的今年，我們在此舉辦這樣一個學術會議，從多個層面，多個角度來冷靜理性地分析、評估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是有發展的與前瞻的意義的。懷德海說：「一門科學，如果不肯忘記它的創始人，那麼它是迷失了、失敗了」(A science which hesitates to forget its founders is lost)。但是，胡適作爲一個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我們不必、也不應忘記他，我們應該做的是理解他，「重新估定他」。胡適先生從不被人牽着鼻子走，也不希望別人被他牽着鼻子走。「後五四」的人站在他的肩上，也許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更能看得遠些。

最後，我祝願這次會議成功，謝謝。

目錄

v	序	陳方正
vii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研討會開幕詞	金耀基
	胡適與思想文化論戰	
3	「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	林毓生
11	重論「問題與主義」之爭	李林
35	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	
	——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	許紀霖
55	自由的失落：胡適與科玄論戰	嚴得非
73	論胡適與人權問題的論戰	姜義華
99	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中之胡適	王中江
113	胡適批判的歷史理解與文化詮釋	胡明
	胡適與現代知識分子命運	
141	胡適與陳獨秀思想之比較研究	歐陽哲生
169	五四知識分子思想——行為的逆差與衝突	
	——以魯迅、胡適、茅盾為例	沈衛威
191	中國自由主義：從理想到現實	
	——胡適與殷海光簡論	章清
223	現代文化移植的困厄及歷史命運	
	——論胡適與《現代評論》、《新月》派	吳福輝
241	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文化精神的探求	吳方

	胡適的思想及其時代	
257	世紀末重看胡適對個人主義的見解	郭穎頤
269	胡適對民主的闡釋	周質平
287	論胡適的文化心態形成的背景及其特點	耿雲志
307	胡適及其實用主義哲學	王煒
317	就傳統理念的理解與哲學的角度	
	對於胡適的評論	劉述先
339	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爲紀念適之先生百齡足歲冥誕而作	唐德剛
353	啓蒙：胡適的憂慮和他的困境	胡成
369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楊國榮
	胡適著述及文學觀	
387	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評議	鄧廣銘
397	胡適與《老子》的時代問題	
	——一段學術史的考察	趙潤海
421	胡適與整理國故	顏非
443	論胡適與詩體解放	沈寂
461	胡適「文學革命」論的文化意義	朱文華

胡適與思想文化論戰

「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

林毓生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

一 三重危機：論辯的歷史環境

在1919年，「五四」與「六三」等重大事件發生後不到三個月的時候，做為中國自由主義主要發言人之一的胡適與做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針對「問題與主義」進行了一次甚具意義的論辯（當時參加論辯的還有藍志先等）。與後來中國知識分子之間許多僵化的、意識形態的重複操作，或未加深思的黨派路線之爭相比照，這是一次相當「開放」的論辯：雙方都持盡量了解對方立場的態度；因為彼此都能嚴肅地看待對方，所以他們都相當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立場。從客觀的觀點來看，這次論辯把彼此立場之得失顯示得相當清楚；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這樣子的交換意見是很難得的。

1919年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悲劇的門檻，過此以後，則一發不可收拾矣！我們可從李大釗與胡適的論辯的性質與後果看到一些這一重大歷史悲劇之成因、性質、與過程的端倪。李大釗對其抱持「主義」的說明，預示着激進的中國共產運動所將採取的意識形態的方向與內容。另外一邊，胡適對中國的變革所應採取自由主義式漸進改革的立場做了有力的辯護；當時獲得不少人的支持。然而，歷史

環境對他所提倡的變革方式卻極為不利。自由主義漸進改革的途徑預設着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秩序的存在；在這樣的秩序之內以漸進和平的方式進行逐項改革才有其可能。但中國當時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均已解體，它是處於深沉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三重危機之中。在這樣整體性危機之中的人們，渴望着整體性的解決。自由主義式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不能適合當時許多人急迫的心態，也提不出立即達成整體性解決的辦法。

吾人如要徹底考察胡適關於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的變革的每一項意見的話，我們會發現他的思想之中包含了不少無法解決的自我矛盾——這些矛盾事實上減弱了他的自由主義的立場，至少從理性的觀點去看是如此。不過，在他與李大釗進行「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時候，他對李大釗所提出的一切問題均需根本解決的質疑，以及他所堅持對個別問題——無論它們之間如何相互關連——仍要個別不同對待的看法，則純正地顯示着，正如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所說，「自由主義永久性真理之一」。

然而，中國當時由各種勢力相互衝擊所造成的歷史環境，卻使胡適的意見看來並不相干，自然也就無法實現。在這樣的光景下，他的意見便漸次失去了「市場」。當時的歷史環境使許多知識分子更被激進的意識形態所吸引，因為他們覺得激進的意識形態所提出的解決問題辦法才是真正切實的，才真正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也是李大釗對馬列主義的能力的聲稱。易言之，他認為唯有在接受馬列主義以後，中國的問題才能獲得解決。這一歷史情況提供了研討五四以後中國捲入政治與思想漩渦的具體證據。

二 胡適與李大釗的基本論式

「問題與主義」之爭肇始於胡適的一篇題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短文。胡氏不同意他的朋友李大釗等在未經深

究之前就草率地接受激進意識形態的作風（激進意識形態此處指無政府主義或馬列主義等）。他寫此文的目的是對他們提出警告：不要把激進主義所提出的虛浮概說與抽象名詞當作根本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靈丹。胡氏指出：所有的主義當初都是針對特定時空之內的特殊問題提出的具體建議。這些建議對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否有用，或是否能夠從它們興起的脈絡中分離出來，以便拿它們來解決另一歷史環境中所產生的特殊問題——這些都是開放未決的，所以吾人不可遽然接受任何主義。我們最需要做的是，研究各項主義興起的特殊背景、它們所要應付的特殊問題的性質、以及它們究竟是否能夠真正解決那些問題。這樣我們便可站在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上來決定當我們試圖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時候，哪些主義值得我們參考。

接受外來主義的工作無法取代對自己社會中衆多問題的理解所需要做的努力。如要了解自己國家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中的問題，我們就先必須對這些問題的特殊性有清楚的掌握。當前「主義」變得很流行，這是很危險的現象。因為它們經由過分簡化的概說與抽象的名詞提供給中國知識文化界一個幻象，以為根據這些概說與名詞便可便捷地根本解決了中國的衆多複雜而特殊的問題。胡適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着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着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李大釗正確地感到胡適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他最近公開宣稱信仰馬列主義而寫的。李氏在1919年8月17日以一封長信的方式對胡氏提出了公開的答覆。他說：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

上文清楚地顯示了李氏接受馬列主義的理由並不在於它的真理性，而是基於它能夠提供工具性效果的考慮。然而，關鍵則是主義的工具性卻是由它的高揚的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來提供的。換句話說，李氏對於馬列主義是否在知識上提出了有關人性、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的理性的真知灼見，興趣不大。馬列主義之所以能使他很快地信服，是因為它底烏托邦主義的政治效用。李氏認為提倡這樣烏托邦主義及其實現的方式，能夠導使大多數中國人參與具有共同目標的政治運動。至於把作為目的的烏托邦主義變為形成政治運動的手段——這一轉折——所呈現的理論上與實際上的諸多問題，李氏不是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便是並不受它們的干擾。

關於胡適對他不顧及實際問題的特殊性而高談主義的批評——胡氏認為那只是空話——李氏答覆說：

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

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着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着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李氏認為馬列主義可以做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工具，它能夠為了適應中國的環境，而做一些適當的調適。根據這樣的看法，李氏認為當他指出中國的嚴峻問題需要根本解決而馬列主義能夠提供根本解決的工具的時候，他已對胡氏的批評給予有力的反駁，所以無需就胡氏的問題提出直接的答覆。

李氏的答覆並未使胡氏覺得他的看法已被李氏充分地理解。胡氏認為李氏的答覆呈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於是，他又撰就《三論問題與主義》，再對自己的立場做進一步的說明。令胡氏特別感到不安的正是李氏主要的論點：把主義當作發動社會運動的政治性工具與認定一旦主義被接受與提倡以後，它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胡氏直指李氏的想法是「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從胡氏的觀點來看，李氏的主張只是呈現了他相信主義能夠如此而已，這樣的信仰無法取代對具體而特殊問題的負責任的研究與以開放心靈來找尋有效地解決問題的努力。胡氏並不反對把各項主義當作解決問題的參考。不過，在胡氏把主義當作解決問題的參考與李氏把主義當作發動社會運動的政治性工具之間有一關鍵性的差異。李氏的立